

# “偏执”恐怕不能解释焚车撞人案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很简单的事情，也会弄得人不明就里，新闻经常是这样的。

11月10日，河北迁安市马兰庄镇一男子驾车冲进镇政府里焚车，逃跑中撞死一名警察，现已被控制。11月12日有多家报纸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一家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闻说，这名男子姓张，他驾驶一辆载有液化气罐的越野车冲进镇政府办公楼，随后烧车，并挟持了另一辆越野车逃窜，逃窜过程中伤及4人，其中一名警察蔡新宇重伤不治。背景材料：张三是马兰庄镇刘官营村村民，行为偏执，有犯罪前科。“早些年，该男子驾车曾撞坏进入马兰庄镇一收费站的栏杆后离开，警方为此也一直在

找他”。在进驻政府之前，该男子曾试图在刘官营村委所在地点火焚车，被人劝阻后，驾车离开。

不知张三为何要到村委会和镇政府去焚车，最终劝都劝不住。可见确实是偏执，他执了什么从而变得偏起来？迁安市外宣局一孟姓人士说，“情况复杂”，案件原因正在调查。但是，张三焚的车是自己的，总不是要自己搞提前报废吧。非找村委会和镇政府不可，总该是与村委会和镇政府有什么过节吧。在事发地，这总会摸不着头脑，总该有眉目的。

现在我们只知道张三偏执，不知他所执何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飞蛾扑火的事情，都是因为作案人“偏执”。有偏执者在珠海驾车撞人，也有偏执者从北京跑到上海去刺杀警察。既然犯案是因为偏执，那就基本要归于精神不够健康。不

够健康，但也不能说是精神病。

打网上瘾已经归于精神病了，偏执不能算。刑事犯罪，最好不要跟精神病沾边，沾了就可能逃脱严惩。打网上瘾，属于精神病，如果没有犯罪，可能送到精神病院去；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砍砍杀杀，那就要接受法律的严惩。偏执，也是如此，有的事情，别人都受得了，都能够自己想通、灌输而通，或者一打而通。偏有人想不通、灌不通、打也不通，不像合格公民的样子。如果硬要不通，又还没有犯案，也有必要送到精神病医院里由药物控制起来，不过，犯了案可不行，报复社会也好，报复镇政府也好，偏执都是“个人原因”，严惩是必要的。个人原因，报复社会，偏执者总是莫名所以，张三更莫名所以一些，我们连他偏执于什么而冲到镇政府

焚车都不知道。

幸而，我们大多是不偏执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是自己想通或者被说通的。剩下一些横直不通的人，也只是用以说明个体的差异，而不是治理有什么毛病。

“偏执”或者“孤僻”出现在那些个人拼死行为的后面，这在人心产生的一种隐然感觉就是，一个人是偏执的，差不多是说一个人“非公民”或“非社会成员”，他要么早送精神病院，要么出事接受严惩，社会没有他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只适于驯服的人。

于是，一次拼死的肇事之后，只要有“偏执”二字就足够解释了。大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驾车冲进镇政府焚车的人为了什么。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

# 主旋律电视剧岂能硬伤多多

■热点纵论

最近在央视黄金档热播的电视剧《台湾1895》，编剧加了不少调料，使得这部电视剧在历史正剧的框架内，总算也跌宕起伏、荡气回肠。再加上神秘的宫廷政治、烽火朝天的战争场面、几个焦点人物的斗法争权，大腕演员云集炫技，这部电视剧还算“好看”。

不过，才播出几集，便被网友“揭发”，不少细节违背起码的历史常识，硬伤雷人。比如，两朝权臣李鸿章、左宗棠被误称为“三朝元老”，提督、总督分不清等等，网上甚至产生了一股像给韩乔生编语录一样的挑刺热潮，这恐怕是编剧和导演没有想到的戏剧性效果。或许，这个副产品会歪打正着地带来收视率的攀升，但对央视来说，特别是视其为主旋律电视剧的有关方面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苦涩的讽刺。

作为一个历史正剧，必须在尽可能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不能为了“主旋律”而强扭角度，这样便会给观众一种不严肃的“解构历史”的不良印象，会让这类电

视剧的传播效果打折。比如，邓世昌在接舰归国的途中，“义救”触礁的日本军舰，就有些贴标签的嫌疑，这表明编剧和导演，未能摆脱传统的“高大全”式的窠臼。

面对网友的挑刺指责，制作者辩解，这是一部“瑕不掩瑜”的力作，并且声称，“我们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前已经请来了社科院专门研究台湾史的历史学家担当顾问”。现在我想问的是，是社科院的哪些历史学家当的顾问？面对一些明显有违历史常识的细节，怎么就没能把握住，这算不算失职？这都是非常令人关心的问题，甚至比电视剧本身，更让我们感兴趣。

不少细节和情节的违背常识，一下子就雷倒了全国观众，让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给人一种“山寨版”历史正剧的感觉，这种溢出的边际效应，如果也算是提升了收视率，不知道是让制作方弹冠相庆呢，还是会暗自羞愧？可能性更大的，恐怕还是前者。这就让我们对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什么不算很高，有了一个真切和深切的理解吧。(肖余恨)

# 以内外分权来稀释“含权量”

【媒体思想之李鸿文专栏】

平静的生活永远是表象，这两天让人不消停的事太多了，所以，《法制日报》11月12日一则“中国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上千万元”的报道，就很容易淹没在新闻的汪洋大海中。

如今贪污腐败的事儿，论官衔，有部级和比部级更大的；论案值，则是屡创新高，还有专门买所房子囤积钞票的主。所以，处级干部们犯罪的那档子事，提不起我的兴趣。

而我后来之所以又关注这则报道，主要是被其中的“含权量”三字所吸引。“含权量”也等同于“含金量”，区别在于前者姓“公”，后者姓“私”。这

则报道说，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据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至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10431人；报道还说，处长官儿不大，腐败案值却并不小，有的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已达上千万元；报道又说，权力监督力量不足是“处长现象”存在乃至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报道完全符合新闻的操作原理，有“病象”，有“病灶”，找出了“病理”和“病根”，最后还开出了“药方”。群众的眼晴早就是雪亮雪亮的，亮得快快要夺眶而出，亮得快快要变成血红血红的了，可腐败案件为何层出不穷？看来，专家开的“药方”有点问题。

完善监督当然是要的，但

报道中的“含权量”才是真正的病根。处长们官儿不大，但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这里，发生了变异，成为一部分处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筹码。“没有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够难办事。”尤其是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权力大着呢。出租车份子钱为什么这么贵，是因为有人从中收了“茶水费”；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有人从中拿了大红包。这可不是我在胡猜，重庆国土部门近来曝出的腐败窝案，就直接推高了该市的房价。地产商出了血，自然要从房价中找收益了。

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权，分权

就能稀释“含权量”。分权可以内部分，让一把手变成多把手，一支笔变成多支笔。也可以外部分，以制度要求公开权力运用流程，通报公文处置结果，再由人大、政协评议，由公众评判是否公正，是否最有效率，甚至将一部分权力交给民间组织也未尝不可。

近来发生的几件有关权力的新闻，促使我又读了一遍曼瑟·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这本书提到了权力分享的逻辑，当然，也提到了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就会变成流寇，就会呈现出一种末日心态，想尽快在权力的有效期内兑现为直接利益。而《法制日报》这则报道，将处长职务犯罪的末日心态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了。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 三聚氰胺，你还有完没完？

■热点纵论

继奶粉和鸡蛋中检出三聚氰胺后，鱼类饲料中也被曝出含有三聚氰胺。据11月13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香港食物安全中心11日晚公布，位于香港长沙湾的海鱼养殖场的一个鱼类饲料样本被检出含三聚氰胺，含量为百万分之六六六。养殖户表示，问题饲料为福州所产的海马牌。

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按最简单的线性思维来推测，既然禽类饲料里含有三聚氰胺，鱼类饲料又能干净到哪儿去？

在上述报道中，行业人士指出，在饲料中加三聚氰胺，早在五六年前就在水产养殖业盛行，后来逐渐“推广”到畜禽养殖等行业，而加入动物饲料中的三聚氰胺，基本来自于化工厂的废渣……在鸡蛋里发现三聚氰胺之后，曾有人编了一个笑话，说公鸡掐着母鸡的脖子恶狠狠地问：“蛋里怎么有三聚氰胺的，你是不是背着我和奶牛好上了？”现在，我不知道这

个笑话该怎么往下续，牛呀鸡呀的是下不了水的，雄鱼稍微有点头脑，它就该知道，雌鱼是没本事给它戴上这顶绿帽子的，只有那无缝不钻的三聚氰胺，它就像一两个两栖甚至三栖恶魔，从水里搅到岸上，从岸上搅到我们的心里，恨不得把全国人民都一个个改造成“吃素的”！唉，三聚氰胺，你还有完没完？

老实说，我真有点烦了，自己虽算不上一个惜命的主儿，但再不惜命，也不愿拿自己的胃和肾当那化工厂废渣的收购站。可看看现在，凡是想吃的、好吃的，好像全被三聚氰胺给玷污了一遍。

为此，我求求有关部门了，你们能不能像俺平头百姓一样，也用点线性思维方式，去前瞻一下还有哪些“漏网之鱼”没被发现？别老是奶出了事，“挤”奶；蛋出事了，“砸”蛋，咱能不能切实建立一套涵盖所有农产品质量的追溯机制，来点硬的，来点狠的，来点顾头也顾脸的较为完善的手段。

(简外)

# 禁止假唱应自央视春晚起

■公民发言

今后，演员或演出团体在营业性演出中出现“假唱”“假演奏”等行为，将可能面临国家法规的处罚。12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就《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11月13日《新京报》)文化部出手约束假唱，是个好消息。不过，营业性演出不可以假唱，非营业性演出就可以假唱了吗？

众所周知，近些年，春晚假唱不时被坊间披露。早在2006年，歌唱家蒋大为就透露，在大年三十的春晚现场，的确有一小部分人假唱。春晚导演对假唱倒是有自己的定义。春晚资深导演袁德旺接受采访时表示，春晚要求的“真唱”就是“真入唱”。

原来只要演员是真的，对口型就算是真唱了。为何要假唱？袁导演的理由是，电视对节目质量要求很高，演唱者的音色更不能打折。

事实上，一些真正的歌唱家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他们也不愿假唱，但无奈电视台的压力太大。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程志称：“在内地，电视台大都以‘保证晚会质量’等理由允许假唱。可任何一位艺术家的演出，也不能保证十全十美。世界顶级的歌唱家有时也会唱破音，但观众认为他尽力了也会尊重他。而电视台的所谓‘完美’，是以牺牲真正的声乐艺术为代价的。”

有水平的演员不愿假唱，观众也不愿看到假唱，那么春晚假唱就没有必要假下去了。无奈的是，尽管坊间炮轰隆隆，但春晚假唱恐怕还不会绝迹，一是因为导演的理由振振有辞，另一方面缺乏约束，他们不认为这是商业性演出。

有网友如此揶揄道：春晚不赢利，歌手不赢利，演员不赢利，伴舞不赢利，CCTV赢利，条文只针对个人不针对机构，所谓非营业性演出也。不知道坚持假唱有理由的导演是不是会如此辩解？

无论如何，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非营业性演出就可以欺骗观众，这种不对称，这种选择性惩罚，是对假唱的纵容，不能服众。央视春晚受众众多，影响大，更要有以身作则，带头停止假唱。(王石川)

# “政策博弈”是消协努力的方向

■今日视点

自上周对15个涉嫌违规的电视购物广告进行公开点评后，“睡睡瘦减肥贴”一类属于禁播范围的减肥电视购物仍然在部分卫视台屡禁不止。北京市消协11月12日致函国家广电总局，建议责令相关电视台停播违规购物广告，并实行“商品及售后服务质量保证金”制，最大限度降低消费者风险。

(11月13日《新京报》)消协雄起了一回，这是很让人高兴的事，至于广电总局会不会马上回应北京市消协的建议，中消协会不会跟进，都是后话，关键是，消协终于有了消费者娘家的样子——不再搞大而空的炮轰霸王条

款，而是实实在在的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了。

更让我高兴的，其实还不是北京消协要求广电总局停播问题购物广告，而是后面的“实行商品及售后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建议。因为我深切地知道，事前预防总比事后追究成本要小、收效要大。禁播问题购物广告，是一个类似于割韭菜之类的事，往往是搞完一茬又一茬，这个问题广告没了，总有层出不穷的继任者出现。但“实行商品及售后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却不一样，这是从制度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好点子，真要能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消费者最大的福音——不仅从电视购物中买东西的人受益，平时在商场超市买东西的人，也

会多一份底气。

长期以来，我们的消协似乎很满足于炮轰人们已经烂熟于胸的霸王条款，虽然这种聊胜于无的炮轰好歹体现了消协的姿态，但如你所知，炮轰从来都没解决过什么问题。因为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来都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利益协商。拿霸王条款来说，消协最该做的，其实并不是频频炮轰，而是代表消费者提出消解霸王条款存在根源的政策性建议。换句话说，消协应该通过代表消费者参与利益协商，将消费者的利益最大程度地体现在法律法规中。前段时间，《食品安全法》草案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比较遗憾的是，在这部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法律修订过程中，

我们并未看到消协代表消费者提出系统性的建议。在这方面，消协实在是应该多学学中药协和医药行业协会。中房协多次上书有关部门要求救市，医药行业协会则针对新医改方案提出了系统性的建议，这两个协会都懂得利用建言献策为他们所代言的群体谋取利益，普通百姓可能会看得不顺眼，但你必须承认，这就是游戏规则。

在医药行业协会联名上书大修新医改方案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出，中消协应该代表消费者提出针锋相对的建议，遗憾的是，中消协没有露面。现在，北京市消协带了个好头，其他各级消协也该习惯“政策博弈”这一游戏规则才是。(本报评论员 赵勇)

# 不要人为放大“国考炮灰”的焦虑

■热点纵论

金融海啸、跨国公司裁员，让瞄准外企的名校尖子生乱了阵脚。在一次次被用人单位招聘“调戏”后，他们发现还是被称为“国考”的公务员考试靠谱。于是，“国考”报考人数再创新高，除少数幸运儿，“更多人充当‘公务员考试的分母’”，他们自嘲是“国考炮灰”。

(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我不知道哀叹为“国考炮灰”的学子，其综合素质、实际能力如何，如果他们学识平平，只是头上顶着北大、清华等名校光环，那么，在激烈的“国考”中成为炮灰，有什么好奇怪的？

“国考”报考人数屡创新高，不是一两年的事了，就算今年没遭遇金融风暴的冲击，“国考”火爆也是意料中事。而“国考炮灰”成为流行语，显然暗含了很多学子这样的心理：金融风暴影响——工作越来越难找——只好报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难度陡升——“国考炮灰”大量出现。

在这条“国考炮灰”生成链中，很多学子把原因全归咎于外部环境了，好像都是社会惹的祸，却少见他们的自省：我在越来越激烈的就业市场中具有怎样的竞争力？

“大学生工作难找”从来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一概而论。在报道中，不少名校学

生有着让人兴叹的就业标准：非500百强的跨国公司不去，非京沪等一线城市不留……如此要求，就是在经济形势大好时期，也不是谁都能如愿以偿的。那些碰了壁的学子有时应该自问：我的就业预期是不是高得与实际脱节了？至于在跨国公司求职不成转而参与“国考”的学子，就更功利了，他们只看到公务员的“安定、体面”，却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他们在大学接受的教育是否与之相匹配？

报道中，一些学子坦承其实有民企要与自己签约，但他

对公务员有“特别的偏好”，决定将“国考”进行到底。这足以反证：所谓的“大学生工作难找”很多时候是个伪命题，这当中的严峻感与焦虑感被人为放大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学子年纪轻轻就过世故，精于利益得失的计算，而忽视自己职业成长的长远科学规划。所以，如果把“国考炮灰”用于自我调侃，则未尝不可，但如果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探讨，那么，它根本就无法证明“大学生就业难”已到了让人如何寝食不安的地步。

(肖风)